

这一周

聚焦

浙江职称改革  
打破学历资历限制

浙江省人社厅4月9日宣布,浙江省将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着力破解人才评价难题,破除以往职称评定唯学历、唯论文等倾向,扭转人才评价和使用脱节的状况。

此次改革事关浙江500多万专业技术人才,通过打破专业技术人才的“天花板”,最大限度释放和激发专业技术人才创新创造创业活力。以往未设置正高级职称的工程、经济、会计、统计等11个职称系列,今后都将设置到正高级。今年,浙江省行业主管部门将结合本行业人才队伍整体水平,制定本系列正高级的具体评价标准和办法,以培养和造就全省“行业大家”为导向,带动本行业健康快速发展。

原有职称评价标准中,强调学历、资历、论文,存在“一刀切”问题。此次浙江省提出坚持把品德放在首位,突出对创新能力的评价,突出对工作实绩的考核,向基层一线倾斜,对外语、计算机和论文不作统一要求,对论文要求从工作和岗位实际需要分别对待,根据不同行业坚持分类评价。此外,打破资历限制,对取得重大标志性业绩成果的人才,可直接申报评审高级职称。

作者:江南

《人民日报》2018年4月10日第11版

温州  
建职教“智能+”专业集群

为积极应对“机器换人”的产业变革,服务地方经济转型升级,温州市日前出台《新时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工作方案》,提出到2020年建成与区域产业匹配的“智能+”专业集群。

《方案》首次明确在全市中职学校开展智能时代新一轮专业结构调整工作,新设一批智能制造、智慧文创、工业机器人等专业,培养与自动化、智能化设备操作匹配的技术型人才;增加人工智能选修课比例;提炼企业生产线上智能化课程元素,推进校企共同开发课程。依托VR(虚拟现实)、大数据、物联网等智能技术,积极开展“智慧教学”“智能实训”等,推动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根据《方案》,到2020年,温州将建成智能类或智能化方向市级示范专业50个、实训基地30个、虚拟现实协同创新中心10个,建成一批呈现特色、品牌发展态势的智能类或智能化方向专业。

作者:蒋亦丰

《中国教育报》2018年4月7日第2版

柯城区打通  
学前教育“最后一公里”

七里乡地处衢州市柯城区最偏远的乡镇,距离城区23.1公里,大部分为山区,乡里15个小朋友多为留守儿童。2012年前,这里的幼儿园是住宅式的,教师没有资格证,教室里仅有一块小黑板、三张小学课桌、几盒雪花片和几根跳绳。孩子们除了拼插雪花片、做算术、写字,就是自己疯玩。2012年底,乡里小学腾出两间教室,作为幼儿园的活动室和午睡室,由小学老师管理和兼任保教工作。

2015年,为深入贯彻国家、省、市的学前教育行动计划,柯城区大力推进学前教育均衡发展,特别是要满足农村适龄儿童入园的需求。虽然七里乡只有15个小朋友,但乡政府还是在2016年到2017年投入资金50余万元,新征用地400多平方米用于新建幼儿园户外活动场地,并修建进园道路100余米,按幼儿园标准配备各种设施设备。

柯城区教育局通过“城乡托管”模式,委派新华幼教集团负责托管该园,使其成为城区省一级园的分园。集团选派一名优秀的编制教师负责管理,还招聘编外教师和保安人员各一名,幼儿园伙食与小学共用,实现营养餐供应。如今,幼儿人数由原来的15人增至23人。

作者:宋云芬

《中国教育报》2018年4月8日第1版

## 上海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

近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本市统筹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意见》,提出到2020年,实现上海高校办学实力和学科水平进步明显,两所左右大学和20个左右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率先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

对部属高校,上海将以部市合作为平台,深化创新上海市政府与教育部等国家部委建立的合作机制,安排地方财政配套资金,支持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支持华东理工大学、东华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和海军军医大学加快开展世界一流学科建设。

对上海市属高校,支持上海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音乐学院、上海体育学院、上海海洋大学等高校加快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由市级财政统筹安排资金,支持其根据一流学科建设目标进行申报,择优支持。

作者:董少校

《中国社会科学网》2018年4月12日

## 大学课堂该如何消灭“水课”

选而不修的尴尬

按照培养计划,大学四年里,天津某高校学生张欣然完成147个学分才能毕业。这其中,除了校院两级的公共必修课程73个学分、专业必修课程33个学分外,她还需要完成26个学分的专业选修课程和15个学分的任选课程。

“几乎每所大学都会流传一本‘水课大全’,我这41个学分的选课关键就是看好不好选、给分高不高、老师点名不点名。”张欣然告诉记者,每到选课季,符合上述要求的课程总会被同学们一抢而空,而对于那种“要求多、给分严格”的课,大家都是“有多远躲多远”。

“‘科学通史’平时不点名,考试划重点,分数还好;‘体育欣赏’节节点名,上课看电影,期末交论文……”记者登录一些高校论坛发现,这些在学生间流传、更新的“水课大全”对上课内容、给分情况等都有细致详尽的描述,有的甚至长达几十页。

“有些课光听名字就没什么兴趣了。平时的课业压力已经很大了,选修课能轻松过关就好。”张欣然坦言,自己没有翘课,已经算是勤奋的了,“‘必修课选逃,选修课必逃’早就是传统。”

选而不修,有的学生是因为根本没把选修的通识课当回事,还有不少同学是因为没能从课上学到自己原本想学的知识。

这学期,北京某校的大二学生张林选修了一门“生活中的地理学”课程,

可没上几次,就打起了退堂鼓:“我是学英语专业的,本身就是零基础,原以为这门课程会根据选课学生的基础进行适当调整。可上起课来却觉得老师好像还在上专业课,讲述内容也多是气象、地质灾害等专业内容,感觉和现实生活离得有点远。”

在清华大学新雅书院院长甘阳看来,这些“水课”正是中国大学与世界名校最大的差距所在:“在大学里面,所谓‘水课’通常出现在非专业课里,一般来说,专业课是相对有保证的。绝大多数的专业课,即使还没有达到比较理想的状态,但至少消灭‘水课’是可能的。我们和世界名校最大的差距,可能就在非专业课,亦即所谓的通识教育的课程上。”

通识课缘何变“水课”

在新雅书院2016级学生开学典礼上,甘阳表示,书院过去所做的全部努力就是为了消灭水课。

事实上,随着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变革,通识教育成为热点问题。早在2015年11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山大学就成立了“大学通识教育联盟”。近年来,与新雅书院类似,复旦学院、浙大求是学院等也相继成为中国高校通识教育的试验田。

一面是在通识教育领域不断发力的中国大学,一面却是对教学内容不买账的学生。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很多同学信奉‘GPA(平均学分绩点)至上’。不少人认为奖学金、保

研、留学等远比一节课带给大家的知识更重要。我绝对不能容忍自己得低分。如果这门课好,但给分严格,我会旁听,但不会去选。”张欣然告诉记者,“功利性选课”是影响大学生宁选“水课”不选“硬课”的重要原因。

“部分教师对待选修课的态度不认真,因人设课、从简开课,很多老师的教学内容不能及时更新,甚至和现实脱节,导致学生不愿意学。”从事教务工作十余年,长春某高校教师郑丽对这种现象颇为无奈,“还有的教师为吸引学生选课,给分随意。这种没有标准的考核也对学生产生了误导。”

建立评价退出机制,为课程“脱水”

“能激发兴趣、培养品位的才是好的教育。如果不能激发兴趣,说明这种所谓的教育只是展示知识、演示技能,没有触动学生的心智结构。”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陆一认为,必须要在如何开课、开哪些课上下功夫。陆一表示:“如果越上学生越感觉到有深意,逐渐触碰到自己原先没有打开过的新世界,攀登上了原先没有站立过的新高度来看问题,兴趣和意义感便油然而生。不在激发兴趣的实质上下功夫,却标榜给学生很大的选择自由,其实是在逃避教育责任。”

“应该砍掉现有的一部分课程,不能‘把通识教育当个筐,什么都往里装’。”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张亚群说,“对于今天的中国大学来说,必须精选通识课程,改善课程内容,课程质量提

高了、对学生真正有帮助了,吸引力自然也就上来了。”

除开课环节要严格把关、精心设计外,采访中,不少专家建议,还要建立课程监督、评价和退出机制。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李奇表示:“一是要有必要的激励机制,鼓励教师精心开课,尊重教师的教学自主权,同时也要符合学生的需求,而不是为了满足工作量而上课,或者为了满足学分要求而选课;二是要有科学的评价机制,改变标准化生产和管理的方式,使教学成为探索、发现、思想碰撞和分享的过程,而不只是一个搬运过程和监督搬运的过程。”

陆一认为,消灭“水课”,实证调查与科学评估同样必不可少:“在复旦大学,我们通过和大学核心课程委员会、模块负责人、教师和专业不同的学生、毕业生等各个层面的深入讨论,研制了‘高能课:中国大学通识课程教学质量测量·诊断·评估·改进’工具。该调查工具设计了11项核心可比指标和5项可选高阶指标,能够多角度刻画每门课程、各模块及总体通识课程的教学质量。在调查数据的使用方面,基于指标数据生成‘吹水指数’和‘刻苦指数’,提倡教学质量要由师生共同负责,直观地筛查出几种高效能课程和‘水课’等低效能课程,并一一对应给出教学支持与管理建议。”

作者:邓晖 张雅凌

《光明日报》2018年4月10日第11版

说吧

清理“示范活动”  
也是教育减负

教育部近日印发关于做好创建示范活动集中清理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开展创建示范活动,必须有法律法规或者党中央、国务院文件明确规定。凡是沒有依据擅自开展的,或者对推动工作没有实际意义、劳民伤财的,或者借机收费、变相收费的,一律取消;凡是面向企业开展、损害市场公平竞争的,一律取消;凡是面向县(市、区、旗)开展、加重基层负担的,一律取消;凡是对象相同、内容相近、标准相似的,一律合并(4月9日《深圳侨报》)。

上述四个“凡是”彰显出教育部此番集中清理创建示范活动的范围之广、决心之大、力度之空前,不仅包括部内各司局、直属单位开展的创建示范活动,还包含教育部主管社会组织以及原由教育部主管、现已脱钩的行业协会开展的创建示范活动。如果各成员单位真能不折不扣地执行清理行动,基本不会留下盲区与死角,这无疑给各地区各部门、各系统各行业减轻经济负担与事务性负担。

长期以来,包括教育部门在内,全国推出的创建示范活动名目繁多:既有综合性的,也有单项的;既有面向全国的,也有面向区域的;既有政出多门的,也有单个部门推动的……已到“乱花迷人眼”的地步,让基层叫苦连连,五花八门,举不胜举。一些学校相关领导面临的是开不完的会、跑不完的腿、参加不完的检查评比。

实际上,在几近泛滥的创建示范活动中,无论有没有依据开展,确实有一部分是没有实际意义、劳民伤财的创建示范活动。比如一些地方让学校创建“习惯达标示范校”,想以此倒逼学校注重对学生开展习惯教育的初衷值得肯定,但是如何检验学校的习惯教育成效,如何证明“习惯达标示范校”真正达标,却不是一件易事,好习惯的养成重在平时的家庭教育,学校只是辅助与补充,家校联系不紧密,缺乏教育合力。

也确有一部分创建示范活动涉嫌借机收费、变相敛财。比如,2016年,教育部等三部委退出全国中小學生交通安全教育活动,该活动办公室曾在全国推广“小黄帽”和校车。然而,有媒体调查发现,原本公益行为的小黄帽工程,却向企业收取上百万元的赞助费和保证金,这显然是在利用政府旗号敛财,这种敛财乱象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也有一些创建示范活动明码标价,参与各方缴纳相应费用后,即可成为“示范”,形成错综复杂的利益链条,不仅劳民伤财,而且损害了教育公平、市场公平。

除耗资扰民,众多创建示范活动还容易催生形式主义。在疲于应付之下,一些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不得不为创建而创建,只要能夺得“示范”名号,往往会不惜人力财力物力,还热衷于弄虚作假、做表面文章,也可能进行利益输送,由此助长形式主义、滋生腐败作风。一旦创建示范成功,便“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躺在示范的功劳簿上睡大觉。相关工作松弛后,原有的不良现象便会反弹。从此角度而言,我们最需要的是常态化、精细化、规范化的管理,而非阶段性、突击性的创建。

期待教育部开展的创建示范活动集中清理行动,不会遭遇曲解政策、擅自变通,而是能产生良好的预期效果,也期待其他部委与地方部门在这方面积极跟进。

作者:何勇海

《法制日报》2018年4月10日



## 规范高中招生秩序要敢于“亮剑”

王铎 绘

《中国教育报》2018年4月10日

## 教育问题不只是教育部门的问题

4月8日晚,电视问政直播节目《问政时刻》第三期“问政”了西安市教育局,最终该局满意率为21.89%。因为一档节目,近期身边的人聊的全都是西安的教育问题。

记得读研究生时,我们第一次上政治与教育的专业课。导师上课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黑板上画了一个超大的多层蛋糕,每一层蛋糕都被切分成不同大小。导师解释说,每一层的蛋糕对应不同级别的政府体系,而每一层不同大小的蛋糕块,代表着这一层面上权力大小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包括政府、公司、学校、非营利机构等等)。

在这个简单的蛋糕比喻中可以看到,教育问题是极其复杂的,拥有不同权力和利益取向的个人、组织都参与其中,而教育部门只是其中的一个角色而已。教育局是政府教育权力的执行者,只有权力分配合理了,政策才能有效执行。

问政时,建设普惠性幼儿园就出现了房地产开发商和教育部门之间的矛盾,教育部门工作人员坦言,这个事情部门很难去管。教育局当然要管这个问题,但要管好的前提是,不同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之间达成共识,相互配合,甚至让渡一些各自的利益。只有这样,才能让教育部门发挥管理和执行的作用,推动教育生态良性发展。

多方合作在解决教育问题上也很重要,这需要了解教育的人来进行统筹规划。比如,在出台相应政策规定前的“调研”,涉及到人口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因此调研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需要不同领域的专家来贡献力量,也需要相应的大数据和技术的参与。这时候,是否可以通过多方力量的合作来

实现科学有效的调研,首要的因素在于,是不是有这样需要懂教育规律的行政人员来设计、统筹和组织。从调研这个小环节中,可以看到随着教育管理专业化和精细化的要求增加,教育部门对于自身人员在教育研究和数据分析上的能力要求也会越来越高。

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父母也是不可忽视的主体。他们手中的权力并不小,不仅可以决定满意与否,还可以选择改变与否。比如,他们可以为孩子选择是否进入学校接受教育,要上哪一种类型的学校,课后上什么样的兴趣班,为孩子营造什么样的家庭教育环境来弥补学校教育的一些弊端,等等。

对于教育这样具有公共属性的服务而言,倘若利益相关方仅仅处于第一层次“利益共同体”的话,教育往往会沦为彻底的“商品”,因此需要他们能够构建事业共同体,甚至命运共同体。而要做的关键在于,教育管理者能够清晰地表达对于教育本质的思考和规划,与不同参与方多展开公开而透明的互动。这样,社会多方力量才能逐渐形成共同的愿景,建立推动改变的共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教育更像是“农业”,而不是“工业”,对于一个城市而言,它让这个城市的根生长得更好。有时候,我们或许会更在意教育中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从而总是在急切地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却忘了解决问题,终究是为了更快地奔向那个理想的愿景。要实现这样的愿景,就不能忘记兼顾多方参与主体,只把教育问题当成教育部门的问题,否则永远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出路。

作者:郭鑫悦

《中国青年报》2018年4月12日